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計劃編號：NSC89-2411-H-034-011-

執行期限：89年08月01日至90年07月31日

主持人：李朝津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劃之重點是國際體系在四十年代形成之際，中國政府採取何種政策回應。至於研究之重點則有三，其一為探討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有沒有形成一個新的世界觀？本研究之假設是肯定的。這種新世界觀一方面繼承中日戰爭以前之對外政策，同時亦由於面臨戰後新時代的來到，從中蘊釀一個新的國際觀。此種新國際觀是有承先啓後之作用。其次為中國在聯合國所扮演之角色。中國在當時是反殖民地國家自居，本計劃希望以其在聯合國之經驗，與日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建立一個比較觀點。第三是中國與國際經濟機構的關係。透過中國之經驗，希望了解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在其始步階段，對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採取何種政策，及有無積極意義。

## 英文摘要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China's responses to this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formation in the 1940s. There will be three points to be articulated in this research plan. First of all, did China develop a new world view in the cours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answer is positive in this study. On the one hand, this new world view is part of the heritag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n the other hand, in face of the coming of a new age, China was searching for new orientation which can set a direction for the postwar situation. The second focus is China's role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ina has assumed the role of anti-imperialist nat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t is worth to compare China's experience with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the War. The third focus is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 二、計劃緣由與目的

今日之國際體系可以說是奠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特別是一九四四年夏天中所舉辦的兩個國際會議—敦巴頓橡園會議及布力頓森林會議。前者為聯合國成立鋪定基礎，成為大戰後國際和平重要柱石，而後者則議訂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之準則，為戰後金融奠基。兩個會議所建立之國際機構，一直成為戰後國際關係之焦點，雖然其作用因環境而時有變動，但其組織及運作方式仍舊持續。展望下一世紀，它們仍會扮演一定角色，故影響不可謂不深遠，亦有研究其源起之必要。

本研究計劃之所以提出，主要原因是中華民國政府近年正陸續開放官方檔案，其中對本計劃最重要是外交部檔案。有關此專

題，去年外交部已批准借閱約一百多冊，另有二百多冊正在審閱中。另國史館亦陸續開放所收藏之總統府檔案，再加上台灣地區其他公私檔案，成爲開展本研究之最有利因素。

### 三、結果與討論

本年度研究重點有二，其一爲中國當時輿論對國際機構之認識及討論，其二爲國民政府處理國際組織之內部作業，分屬本研究第一章及第二章部份。

有關中國輿論之資料頗爲龐大，首先是大陸已影印出版部份重要具代表性之報紙，包括大公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及申報等。其次是國史館收有大量三十及四十年代之報紙，其範圍由省級至縣級，無所不包，缺點是佚失甚多，不容易求得連續性。第三是黨史會收有不少三十及四十年代出版之雜誌，所收範圍亦相當廣泛。

中國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正式展開對日抗戰，全國總動員。由於戰爭關係到國家存亡，外交政策亦以促成抵抗日本爲主，不過留意中國外交的人，並未完全忽視國際組織的重要性。有關聯合國之最早評論，目前是見之於1941年8月18日武漢日報，由張忠絃所寫之〈戰後的和平機構〉。此文一方面是回應同月羅斯福與邱吉爾所發表之〈大西洋憲章〉，但亦見到歐亞二洲已正式捲入戰火，國聯對此完全束手無策，實在有重組國際機構之必要。自此以後，隨著戰爭擴大，討論聯合國問題文章亦愈來愈多。

有關聯合國的討論，可以概略分爲現實主義派及理想主義派。現實主義派認爲聯合國之主要任務是維持世界和平，防止侵略，

如何保存目前主權國家之領土及權益是聯合國最主要之任務。理想主義派則以維持世界和平只是聯合國的初步標，其最終目標則是要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促進人類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方面之交流。無論是現實主義派或理想主義派，對聯合國都給予相當高之重視，不過由於目標有差別，在應用到中國之對外政策時便有落差，從而產生矛盾。

至於國民政府處理聯合國之過程，由於外交部之檔案逐步開放，故有機會查閱有關聯合國成立時期之幾個重要會議之來往公文，有助了解中國聯合國政策之形成過程。然仍有美中不足地方，首先是外交部國際組織司仍稍見保守，部份檔案之時限雖只是四十年代，仍不願公開。其次是不少公文多涉及程序問題，少及實質，故稍覺瑣碎。因此必須參考其他檔案，其中最有用是外交部東亞司檔案及財政部檔案。當時東亞司長楊竹雲負責聯合國商討之聯繫，故有不少檔案留下，另財政部介入亦深，亦保存不少原始討論文件。

外交部在一九四一年成立「外交資料整理委員會」，爲戰後和平會議作準備。但其後歸國防最高委員會指導，於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正式成立，參加者有外交部、財政部、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及農林部等單位，由委員會指定研究課題，各單位單位負責搜集資料並呈交研究報告，該委員會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共開會八次。國防高委員會另亦成立一國際問題討論會，包括國際政治、國際經濟、中日問題及國際自由平等問題等四組，每週開會一次，對有關中國出席和平會議應有主張逐項討論。其結果爲一九四四年敦巴頓橡園會議中國防最高委員會所提之方案。

#### 四、計劃成果自評

本計劃涵蓋範圍，原擬定由一九四一年前後至一九四六年，即由聯合國之準備到其正式成立，中國在此過程中的各種對應態度。不過由於涉及範圍過於廣泛，資料繁多，故必須縮小研究課題。去年雖曾前赴上海，參加《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以〈顧維鈞與舊金山會議〉為題之論文，不過本年度之研究重點，仍以一九四一年前後至一九四四年準備時期作為中心。至於有關成果自評，暫分列如下：

本研究可以增加對聯合國之了解。聯合國成立雖為一九四零年代之重要國際事件，當時國際政治人物及媒體均極為重視，給予高度評價，但有關此期間的研究卻極為缺乏。大概聯合國之研究多集中在其成立以後之活動，特別是對世界和平有貢獻之活動，其原因不外是以實用為出發點。然而若不了解聯合國成立之背景，則無法掌握它以後的演變，純然由現實角度談世界組織，不但會失去原來設計之本意，而且亦不能由整個國際架構的變化了解聯合國存在的意義。

本研究亦可以加深對四十年代中國外交之認識。向來討論四十年代之中國外交，一向集中在抗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忽視中國對外態度有結構上的轉變。即中國在中日戰爭之中成為一個真正之民族國家，原因不單止是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更重要是在抗日的過程中，一個權威的中央政府正在形成，反映到對外政策便是要建構一個平等的民族國際秩序，聯合國是這個政策的具體呈現。對聯合國的重視不單是政府，民間各階層對之亦有頗高之期待，其影響並不限於國民政府，亦可遠及至一九四九年以後。

本研究不足之點約有兩處，有待日後補

充。首先是未能利用國外資料。外交史之研究最著重不同國家資料之互証，聯合國之成立涉及世界各主要國家，雖不可能參考全部，但起碼作為最重要成員國美國的檔案應要引用，位於華盛頓特區之美國國家檔案局，收藏十分豐富，應該使用。另外位於紐約的聯合國圖書館，收藏自聯合國成立以來之各種公私檔案，是研究本題目不可或缺之地方。不但是外國資料，國人在海外之資料亦十分豐富，當時駐外大使的顧維鈞，外交部長宋子文及外交部次長胡世澤，就中國之聯合國政策有甚深介入，其個人檔案均存於哥倫比亞大學及史丹福大學，亦是研究本題目不可缺少。故日後有到海外進行研究之必要。

其次是有關聯合國成立過程中，經濟層面之研究仍嫌不足，特別是有關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之成立，雖然並非聯合國屬下機構，但仍是聯合國體系重要組成部分。有關聯合國之經濟活動，需具備經濟專業知識，計劃執行者非經濟專才，故研究過程中遇上不少觀念性問題待解決。另外有關聯合國之經濟活動，除聯合國本身之報告外，亦缺乏歷史性回顧文獻。然聯合國本身之報告多著重解決現實問題，少學術性探討，故極缺乏參考書籍，亦是本計劃未來要解決之問題。

總括來說，有關中國對聯合國成立政策之研究，目前只屬起步，要深化本題目，仍待日後研究的進一步發展。